

认知学角度下的拟态环境和 中国同南亚地区合作

蒋昌建* 曹逸帆**

【内容提要】 本文就目前中国与南亚地区合作关系展开分析,旨在通过对“拟态环境”影响机制的分析,来寻找改善“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同南亚地区合作关系的途径。“拟态环境”对合作关系的影响主要分为积极引导和误导两个方面,“积极引导”中笔者采用了中国与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两国的关系进行了详细案例说明,“误导”主要是以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关系作为背景展开阐述。最终得出的探索路径包括:继续发挥“拟态环境”对于中巴关系的积极引导作用,着力消除“拟态环境”对中印关系的误导作用,加强南亚其他国家“拟态环境”的构建,加强对学界、智库和媒体的公共外交,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

【关键词】 软实力 公共外交 拟态环境 南亚 地区合作 “一带一路”

DOI: 10.16608/j.cnki.nyyj.2017.04.03

南亚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加之地理位置紧邻中国,与南亚地区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有助于中国国内安全及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国特别注重与南亚国家的战略合作,并主动加强沟通以增进政治互信,双方高层交往频繁,例如中巴建立了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印也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同时也将南亚地区作为“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重点地区。“一带一路”倡议一经提出,中国与南亚地区诸国的合作关系也

*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中美友好互信合作研究计划研究员

受到了普通民眾的高度重視。但是,由於宗教的多元化、社會異質性以及文化的包容性程度不一,加上歷史因素和地緣政治現實,南亞地區各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狀況存在較大的差異,與此相應,這個地區不同國家之間的關係,以及南亞國家與中國的關係都處於相對複雜的狀態。“一帶一路”倡議背景下,中國與南亞地區之間的合作也被這種複雜關係所影響,而人們對於這一複雜關係的認識,以及在其基礎上形成的相關輿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大眾傳播媒介的影響。而作為普通民眾形成相關認知的主要渠道的大眾傳播媒介,在一定程度上並沒有起到客觀報道、增進了解、推動合作與交往的作用。

特別是南亞地區主導性國家印度,對“一帶一路”倡議響應並不積極,而且在戰略層面上存有很大疑慮。2016年,“一帶一路”建設已經初步完成規劃和布局,逐漸向落地生根、深耕細作和持久發展的階段邁進。2017年5月,在北京舉行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正是這一轉變進程的重要里程碑,但印度缺席了本次峰會。而且印度國內主要媒體在為何沒有派出官方代表團的相關報道中,普遍強調“一帶一路”將鞏固中國在亞洲的優勢,壓縮鄰國的戰略空間,從而引發周邊國家的恐慌;印度官員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不約而同地強調涉及克什米爾地區的“中巴經濟走廊”是對印度領土和主權完整的侵犯。^①印度媒體的報道在很大程度上傳播了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對於“一帶一路”倡議的認知,使得信息不對稱的普通民眾在對“一帶一路”倡議的認知上進一步被誤導,從而阻礙中國與印度以及其他地區國家在“一帶一路”框架下的合作。

從上述事例可以看出,在“一帶一路”倡議背景及建設現狀下,除了基礎設施建設、貿易合作及資本投資等“硬實力”因素對南亞國家與中國的合作影響作用較大外,包括宗教、意識形態、歷史刻板印象等因素作用的大眾傳播媒介所構建的輿論環境,即“軟實力”因素相關影響不可小覷。因此,從擬態環境入手,深入探討如何通過軟實力影響南亞地區國家公共輿論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推行和實施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① 《印度官員宣稱:中巴經濟走廊侵犯“印度主權”》,環球網,2017年2月23日。<http://world.huanqiu.com/hot/2017-02/10186595.html>

一、软实力理论框架下“拟态环境”与认知的关系

约瑟夫·奈认为 软实力是“通过吸引而不是强制或者收买来得到你所希望的能力。软实力源于一个国家文化、政治理念和政策的吸引力。当我们的政策在别人看来具有合法性的时候,我们的软实力就会获得增长”。^① 软实力的目标在于,通过吸引而不是强迫,令其他人希望得到你所希望的结果。^② 与硬实力相对 软实力的作用在于“塑造他人的偏好”。^③ 奈强调,如果能够将具有吸引力的软实力加入你的工具箱,那么,你将能够节约胡萝卜和大棒。^④ 通过建立长期的关系,影响对象国的决策环境,软实力能够促进一国的公共外交。^⑤ 在奈看来,公共外交是实现软实力的重要手段,两者之间有一种内在的、相互依赖的关系。^⑥ 通过与其他国家公民的交流,从而鼓舞和影响外国受众,促进本国利益,实现外交政策目标。包括教育交流计划、国际交流访问计划、语言训练、文化交流、广播和电视传播、互联网站等。公共外交目标在于塑造一国的形象和声誉,从而影响对象国公众的态度。

在软实力理论框架下,公共外交影响对象国公众态度的直接方式就是影响公众舆论。研究公共外交实际上就是研究软实力是如何影响、告知和经营外国公众的。^⑦ 古德史密斯(Benjamin E. Goldsmith)和堀内(Yusaku Horiuchi)为了检验软实力对于国际关系是否重要,对象国关于他国外交政策的公共舆论是否影响这些国家的外交政策行为,就58个国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公共舆论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这些国家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公共舆论确实影响这些国家对于美国的政策。而且,如果美国外交政策对于这些国家

①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Books 2004) p. x.

②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p. 5.

③ Ibid.

④ Joseph S. Nye Jr., “What China and Russia Don’t Get about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April 29 2013.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3/04/29/what_china_and_russia_don_t_get_about_soft_power

⑤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p. 8.

⑥ Efe Sevin, “Understanding Soft Power through Public Diplomacy in Contrasting Polities,” in Naren Chitty, Li Ji, Gary D. Rawnsley and Craig Hayden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Soft Power*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p. 62.

⑦ Efe Sevin, “Understanding Soft Power through Public Diplomacy in Contrasting Polities,” p. 62.

公众的影响显著,舆论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则是巨大且强劲的。研究同时发现,考察国家的领导人在权衡、决策时,确实注意倾听本国公众的态度和意见,因为他们的决定有可能引发公众关注甚至反对,从而影响本届政府的合法性。在此基础上,古德史密斯和堀内强调,应当重视软实力和公共外交在影响对象国舆论、塑造本国积极国家形象方面的重要作用。^①

基于 Web 2.0 思想和技术为基础的社交媒体的出现和扩展,个体行动能力被再造。个人通过社交媒体,在信息制造、发布和传播上打破了先前由国家及其机构垄断的传统局面。人与人之间分享、合作和协调一致行动的能力,突破了过去交易成本的限制,个人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的主动权被大大加强了。各国社会的无组织群体正在通过社交媒体进行“再组织化”,甚至呈现出一种超越组织的力量。^②因而,媒体的五种政治功能——信息供给、议程设定、公共监督、政治动员和政权合法化^③——对于一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在此种背景下,为了更好地分析媒体影响舆论的路径,在外交实践中减少消极影响、增加积极影响,本文引入拟态环境的概念。

(一) “拟态环境”与认知的关系

拟态环境的概念最先由李普曼提出,他认为“真实面对的现实环境实在是太庞大、太复杂、太短暂了……我们不得不在能够驾驭它之前使用比较简单的方法对它进行重构”,“为此每个人的行为依据都不是直接而确凿的知识,而是他自己制作的或者别人给他的图像”,“他人脑海中的图像……就是他们的舆论”,“而……报纸必然地、不可避免地反映着……因此也或多或少地调节着……舆论的强度。”^④在李普曼看来,像报纸这样的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制作给受众的图像,就是在人和客观环境之间楔进一个“拟态环境”^⑤。可见,拟态环境理论强调,传播媒介在为大众提示环境信息时会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传播者以及受众的认知水平、二者的价值观念以及外界其他控制因素等,也正是由于这些影响因素,使得拟态环境与现实环境存在一

① Benjamin E. Goldsmith and Yusaku Horiuchi, “In Search of Soft Power: Does Foreign Public Opinion Matter for U. S. Foreign Policy?” Crawford School Research Paper No. 8,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https://crawford.anu.edu.au/pdf/crwf_ssrn/crwfp_1108.pdf

② 王文《Web 2.0 时代的社交媒体是如何影响世界政治的》,《外交评论》2011 年第 6 期,第 63 页。

③ Filiz Coban, “The Role of the Media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the CNN Effect to the Al-Jazeera Effec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Foreign Policy*, Vol. 4 No. 2, December 2016, pp. 45-61.

④ 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 3-15 页。

⑤ 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第 23-34 页。

定的差距。

从另一个角度看,由于人们对于很多事物及信息的了解程度很低,甚至与这些事物及信息的现实环境存在着脱离的现象,也就是说有一部分世界是人们接触不到、见识不到和想象不到的,因此想要了解这个世界就会非常依赖大众传播媒介。而媒介又被称作人体的延伸,即普通受众在很多情况下都是通过媒介来观察和了解事物或信息的,只有借助媒介的延伸作用,才能够间接性地想象和接触那些原本接触不到的实体世界。一般来说,观察和了解本身就有思维在参与,思维是个体化的,进而导致受众在面对事物或信息时受自我意识及客观环境的双重影响,因此说大众传播媒介并不像镜子一般对现实环境进行反映。大众传播媒介所构造出的“拟态环境”无法等同于现实环境。当人们习惯性地接收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的信息时,大众传播媒介就可以依据自身认知来对现实环境内的信息进行选择与加工,传播给受众,进而直接引导和影响受众的认知。因此,可以说“拟态环境”与人类认知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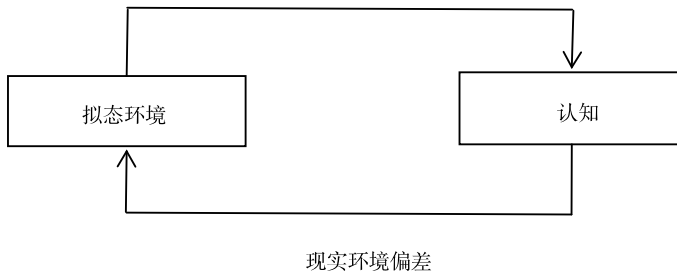


图1 “拟态环境”与认知的关系

因为“拟态环境”的形成和发展,人们对于事物、事件的相应行为开始变得不一定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因为受众认知的环境发生了变化,由真实的现实环境变成了大众传播媒介传播及塑造形成的拟态环境。但是,受众的行动却不是拟态行动,而是实际行为,因此产生的结果也会直接作用于现实环境,而不是拟态环境。所以,无论是大众传播媒介还是普通受众在利用“拟态环境”时,一定要让它有助于对现实环境更好的理解和把握,千万不能让“拟态环境”替代现实环境。

应用于本研究亦是如此,普通受众对于中国同南亚地区的合作事宜及信息并不了解,因此对于二者之间合作关系的认知基本都是来源于大众传播媒介构建的“拟态环境”,而这种拟态环境是媒介传播者通过对中国同南亚地区

的现实合作环境进行选择 and 加工后重新构造的。假设普通受众日复一日地接收这些重新构造的信息环境,那么其认知必然会受到传播者的引导。

(二) 多元媒体时代下“拟态环境”的特点

大众传播媒介构建拟态环境的作用,我们要重视,尤其是现在大众传播媒介已经进入多媒体时代。这个时代的特性决定了,它对人们的认知和舆论的影响更大更深,进而对国家的政策和国家间关系影响更大更深。根据最新的一项报告,在网民人口为世界第一的中国,国际舆论场已经从传统媒体转向社交媒体。^①而在印度,最新一项报告表明,尽管网络媒体、自媒体及社交媒体尚不能与传统媒体平分秋色,传统媒体远超过其他类型媒体占据主要地位,但网民人口为世界第二的印度在线媒体和新媒体发展迅速,从社交媒体来看,网民使用社交媒体相较中国而言更为多元。WhatsApp 为印度目前使用人数最多的社交软件,覆盖约 96% 的智能手机用户。脸书(Facebook)则是仅次于 WhatsApp 的印度第二大社交软件,网民覆盖率 50% 以上。其他在印度流行的社交媒体还有推特、Instagram(图片社交平台)、Pinterest(图片社交平台)、Quora(问答网站)、Snapchat(照片分享)等。^②在印度的国际舆论场中,新媒体对受众舆论的影响,特别是城市受众舆论的影响不可低估。同样,这些年,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Skype、Instagram 等社交媒体在巴基斯坦也得到迅速发展,人们热衷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意见、经历、建议和在一些问题上的反馈等。^③所以,要了解虚拟环境的构建对“一带一路”倡议实践的影响,我们应全面了解多元媒体时代下“拟态环境”的一些特点。

首先,传播主体的大众性,使得拟态环境构建主体多元化。多元媒体使公众拥有一条可自由表达诉求、充分阐释个体思想的虚拟化渠道,它确保任一个人皆可同时具有“旁观方”以及“当事人”等不同的身份且可自行自由转换,最大限度地揭示出公众精神力量的内涵与外延。换言之,多元媒体时代下以拟态环境为对象展开的重构,重点表现为对传播主体自由切换的把控上。这一层面的主体传播的自主性对照常态下的拟态环境而言,无疑为现实环境中的群众个体提供了更多掌握并了解客观现实、建设常态民主舆论氛围的有效途径,为拟态环境实现平民化与普及化传播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在多

① 参见《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7 年版。http://ex.cssn.cn/zk/zk_zkgb/201707/t20170705_3569552_5.shtml

② 《美通社:印度媒体传播概况 2017》。http://www.199it.com/archives/613097.html

③ <https://propakistani.pk/2016/01/26/state-of-social-media-in-pakistan-in-2016/>

元媒体时代信息流比较大,并且信息流的流向以及相应的流量不容易掌握。受众获得同一个信息的途径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不像之前那样传播媒介比较单一。当前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拟态环境信息平台的不断增加,使得拟态环境开始朝着多方平台的方向发展,拟态环境的建构进入了多元主体参与的时代。

其次是传播受众的交互性。毫无疑问,多元媒体向社会大众展示出一条可主动发布且自由接收信息的高效途径,这使拟态环境下的受众由传统的单向接收信息演化成双向互动交流,受众由此拥有更广的选择权,即受众可自主选择接收、发布或是传播的信息类型、内容与方式,并可确保双方的互动实现实时化与交互化。就多元媒体时代而言,传播媒体发展日新月异,原创与整合内容也花样百出,对应的传播渠道与形式更是多样化。就传播多维度这一视角考虑可知,拟态环境可以承载更多的问题,与此同时,多元媒体时代不断增加且巩固了拟态环境在大众心目中的地位。

再次是传播速度的迅捷性。多元媒体能确保受众马上接收到信息或对信息进行转发与编辑,使信息的传播不再受限于空间和时间,受众可随时、随地和随意借助各类智能终端或通信设备,完成信息的实时接收与即时发送,传播速度精准、高效且极速,这一点是传统传播手段无法企及的。当前媒体已经突破单一的信息传播形式,并不是在一种或者几种传统的平台上进行展现,而开始趋向于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与传统媒体时代的拟态环境比较发现,现在的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更具有深度。新媒体具有高度的延展性以及即时性的特点,其不断激发拟态环境的影响力以及覆盖面积。目前来看,巴基斯坦占据主要地位的仍然是包括国家电视台、国家广播电台及联合通讯社在内的官方主流媒体,但是随着私营媒体数量的增多,私营媒体影响力逐渐与官方媒体相对等。就媒体形式而言,主要包括广播媒体、电视媒体、平面媒体、社交媒体等。巴基斯坦的国际新闻主要来自于英语世界,且外国媒体的进入存在严格的法律壁垒。

最后是传播内容的碎片化。多元媒体使得人人可自由地收、发或是传播资讯与信息,而且一方面体现各个区域、文化、信仰、种族、政治意识形态的刻板印象,一方面不受语言和传播渠道的束缚。任何信息发布主体皆可随时、即时借助多元媒体与其他受众完成信息的融通、交互与分享。多元媒体时代使拟态环境下的信息包括各种碎片化内容,且这些内容皆可借由各种渠道传播,这也是多元媒体时代下拟态环境传播开放性的重要体现。这一开放性虽

然使得多元媒体时代拟态环境的建构带有主体多元和内容碎片的特点,减少了解构以及阐述的中间环节意义与内容发生信息生产的主体一元化所导致的全面畸变的可能。如印度新媒体发展过程中,社交媒体公号及移动端软件优势较为突出,这使得传媒内容开放性及碎片性提升了很多。

二、“拟态环境”对中国同南亚地区国家合作关系的影响机制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逐步推进,国际传播环境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扁平化特点,也就是说基本上打破了大众传播媒介传播过程中受到的政治、地理、经济等因素限制。大众传播媒介塑造虚拟环境的作用使其自然地成为一些国家用来营造对自己有利的政治舆论环境的工具,进而重塑世界对国际关系的认知。被主观判定为不符合这些国家利益的国际合作,其现实环境就会被这些国家控制和影响的大众传播媒介进行误导性的虚拟化。“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其逐渐形成的相关国际合作大框架引起这些国家的高度关注。而南亚拥有牵连东西、带动南北、沟通海陆的区位优势,具有其他地区难以企及的重要地位,因此南亚与中国的合作状况某种程度上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成功实践的试金石,“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方、参与方和阻碍方、质疑方难免都基于各自的战略意图利用或者影响大众传播媒介对于相关拟态环境的构建。

由于人们不可能都能够直接接触客观或者现实环境,人们常常接触到的是大众传播媒介所构建的“拟态环境”,尽管人们对于事物、事件的相应行为不再完全是对现实或者客观环境的反应,因为受众认知的环境发生了变化,但受众的行动却不是拟态行动,而是实际行为,因此产生的结果也会直接作用于现实环境,而不是拟态环境。所以,无论是大众传播媒介还是普通受众在利用“拟态环境”时,一定要让它服务于对现实环境更好的理解和把握。拟态环境下受众实际行为作用于现实环境,一方面会引导现实环境向相对有利的方向演变,一方面也会误导现实环境向不利的方向演变。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尽管大众传播媒介塑造的‘拟态环境’同现实环境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和距离,但是因为人们是依据大众传播媒介提示的某些信息来对环境进行认知并采取行动的,这些行动作用于现实环境,便使得现实环境越来越带有

了‘拟态环境’的特点,以至于人们已经很难在两者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①目前来看,中国与南亚地区诸国的关系比较微妙,但是南亚诸国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意义重大,因此,大众传播媒介重组构造的“拟态环境”因其能够引导受众对于中国同南亚地区合作关系的认知,就显得更为重要。“拟态环境”对中国同南亚地区合作关系的影响机制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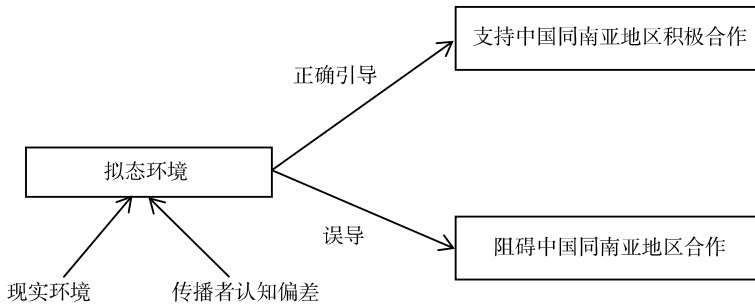


图2 “拟态环境”对中国同南亚地区合作关系的影响机制

(一) “拟态环境”的积极引导

众所周知,中国和南亚的巴基斯坦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安全上都有非常亲密的合作关系。“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巴经济走廊项目的制定与实施更加强两国友好相处的共识,旨在能够加强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交通、能源和海洋等多个领域的沟通和合作,提升两国的联通性,进而促进中国及巴基斯坦的共同发展。普通受众并不能够亲身体会而得知两国在有些项目展开密切合作的信息,多多少少是通过官方、非官方的媒体构建的“拟态环境”得知的,这种“拟态环境”对现实环境进行了选择和加工,对于引导普通民众的舆论具有重大影响作用。虽然由于巴基斯坦本土政治因素产生的对中巴经济走廊项目的负面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国的合作关系,但是中国和巴基斯坦政府针对媒体舆论危机迅速展开积极的响应并采取相应的舆情引导措施。如巴基斯坦政府发言人对于“一带一路”项目实施过程及带来的好处进行详细说明,并逐一澄清不实言论,发挥官方权威,抢夺话语权,从而提升民众知情率,逐步引导并构建良性的公众舆论基础。^②

① 周灿华《拟态环境中虚假新闻对受众心理影响的负面解读》,《理论与现代化》2010年第3期,第99页。

② 王茜婷《如何正确引领“一带一路”的国际舆论——以中巴经济走廊项目为例》,《传媒》,2017年第2期,第39~41页。

此外,在任何形式的外交发言中,中国高层领导人及主流媒体传达的都是这样的一种理念,即不管日后中国发展得如何强大,始终都会记得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友好关系,始终会坚定不移地将巴基斯坦作为好邻居、好兄弟,始终践行和期冀与巴基斯坦休戚与共、携手发展。同中国政府一样,巴基斯坦官方与主流媒体也是一如既往地维护两国关系,特别是在国际、地区等问题上,始终维护中国的利益,并向民众传达两国之间长期建立友好关系的决心,以及中国为巴基斯坦带来的实际利益。^①

在这种舆论引导下,中国与巴基斯坦两国人民相互之间的好感度一直保持高位。2015年发布的《全球40国对华好感度调查报告》显示,巴基斯坦对中国好感度最高,占比高达82%。^②除了各种形式的官方的合作外,自由贸易也加强许多,包括零售业、电气设备业、旅游业等。《“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2017)》显示,2016年全年,中国与巴基斯坦的进出口总额为193.5亿美元,在所有64个沿线国家中排到第13位;中国对巴基斯坦的贸易顺差高达155.3亿美元,在沿线国家中排在前5位。^③笔者将这种引导机制概括为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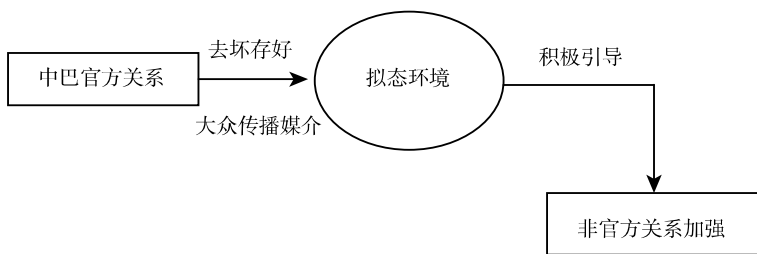


图3 “拟态环境”对中巴关系的积极引导机制

此外,近年来经济飞速发展的孟加拉国也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地区的重要响应国。孟加拉国的发展前景、逐步稳定的政治环境以及良好

① 杜幼康《“一带一路”与南亚地区国际合作前瞻》,《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第8期,第59~69页。

② 《全球40国对华好感度调查:巴铁最友好日本人最抵制》,人民网,2015年6月25日。
<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625/c1002-27206618.html>

③ 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大连东北亚大数据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有限公司和大连瀚闻资讯有限公司合作编《“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2017)》,2017年3月发布,第9、19页。

的国际信誉都使得我国非常注重与孟加拉国的合作关系,因此,对于孟加拉国的帮扶输出相对较大。我国各方大众传播媒介也善于利用这一点,构建一个积极的拟态环境。例如,“中国红十字会向孟加拉国洪水灾区捐款”这一事件,迅速在各大新闻媒体、互联网络上传播开来,孟加拉国民众在接受这一信息时就会对两国的关系产生良性的认知,进而影响其在两国合作关系中的个体行为。

(二)“拟态环境”的误导

同中国的发展历程一样,当前南亚地区的印度也在快速实现现代化,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也在加速变化。然而,尽管双方高层的双边会晤不少,但两国关系仍然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就双边层面而言,中印互信不足一直是妨碍两国进一步发展合作关系的主要障碍,虽说中印两国领导人皆强调并持续重视中印关系发展的战略高度,并强调以长远眼光来认识中印关系,但双方所指内涵差异较大。比如在边界问题上,我方突出边境经济与贸易合作,对应的印方则强调划界问题。这种差异化的战略考量自然而然会影响双方对于两国关系的整体认识以及未来发展。印度的姿态成为中国与南亚地区合作是否顺利的关键。但是,印度又是我国“一带一路”南亚地区建设重点战略国之一,印度与中国又都是“金砖国家”的成员国,因此,中印之间合作关系的良性化循环对于两国来说都是意义重大的。近年来,中国和印度在产能合作、基础设施建设、国际经济治理等方面达成了很多共识,却还有很大的发展前景及空间。长远来看,处理中国和印度政治、军事和经济三方面的关系,用“求同存异”这四个字来形容无疑最为合适。

其次,就地区层面而言,印方混淆“一带一路”与“珍珠链”的内涵与外延,即印度一直担心中国强化在印度洋地区的辐射力,并对其主导该地区各项事务中的地位造成不利影响。近些年来中国持续强化与缅甸、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等国的海港建设合作并取得阶段性的丰硕成果,印度国内战略界对此趋势皆抱有忧虑,由此形成所谓中国借助“珍珠链”包围印度的思想。2014年我国潜艇两次停靠科伦坡港,印度国内媒体对此反映强烈,“中国威胁论”在印度持续发酵。在此背景下,印度大众传播媒介与学界对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意图广泛存疑。

最后,就全球层面而言,印度的“东向行动政策”的部分战略契合于美国提出的“亚洲再平衡”战略,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被德国战略分析家

认为是针对美国该战略的反制手段,印度媒体持此看法者不在少数。就中美印三国关系而言,印度虽不断强调“战略自主”,保持中立,然而就考量涉及国家安全的远期战略利益来说,印度明显偏向于美国。在印度看来,美国为借重目标,而中国则为其防范对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识。

事实上,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抑或是安全上的合作都是双赢的,中国加强与南亚地区的合作除了能够将“一带一路”倡议很好地付诸实施外,对于南亚地区的发展也十分有利。印度将南亚次大陆视作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千方百计地强化在南亚次大陆的军事存在和商业存在,除了自身的原因之外,还受美国、日本等其他经济强国的影响,他们试图通过与印度结盟来制约中国。特别是美国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及大国地位,始终在背后支持印度向中国挑战,并利用其强大的媒介传播能力来营造印度与中国势均力敌的敌对关系,使得印度对于自身的评价过高,在各方面不断挑衅中国。^①

此外,由于印度过去曾为西方强国的殖民地,其政治文化中夹杂了许多西方因素,对于中国的认识也是片面的、不完整的,加之近年来其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联系比较紧密,非常容易受美国等媒体对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舆论环境的影响。而印度普通民众对于中国政治立场、安全战略以及经济合作意向的了解并不是靠自身,而是通过国内、国际的大众传播媒介来认知的,例如,在中国对南亚地区“一带一路”倡议推行后,美国媒体借南亚国家的学者的意见宣称“北京的南亚政策有两大目的,因该地区在中国推出的雄心勃勃的欧亚基础设施和一体化计划,即‘一带一路’计划中的角色而得到加强。首先,中国的目的是在经济上与印度接触,以利用其不断扩大的市场。其次,中国的目的是通过在南亚发展关系,削弱印度的地位,从而利用印度自身的外交和经济失误,尤其是它无力打破地区贸易壁垒。”^②这种信息构造的“拟态环境”势必会对印度国内普通民众造成误导,加之其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民族主义情绪,“拟态环境”的误导使得印度民众对于中国的影响力持负面评价的比例增加很快,而持积极评价的比例也有很大的回落。根据英国 BBC 最新

^① 赵瑞琦《“三个舆论场”与对印传播战略——“一带一路”下的中国国际话语权建构》,《齐鲁学刊》2016年第1期,第74~79页。

^② “As China Expands Its Ties in South Asia, It Faces a Familiar Rival: India”. <https://www.worldpoliticsreview.com/trend-lines/19831/as-china-expands-its-ties-in-south-asia-it-faces-a-familiar-rival-india>

的一项全球性的民意调查,印度民众对中国影响力持积极态度的比例从先前调查的66%下降到44%,^①如果这种势头继续持续下去,必将对两国的正常合作关系产生不良的影响。

而从印度自身来看,由于公众的文化水平和认知能力,他们更倾向于选择印度官方或主流媒体的相关言论和看法,这无疑加剧了片面评论中印关系声音的影响力,而印度政府对于媒体的控制力比较弱,导致印度民众的意识中对于中国的抵制情绪比较重。例如,在中国推行“一带一路”倡议后,印度根据自身战略需求,推出了“季节计划”。尽管印度政府一直在强调“季节计划”并不是针对“一带一路”的反制行为,但是仍有很多学者和专家对其进行过分解读,引导印度民众对两国关系的持续不信任。反过来看,大众传播媒体将印度对中国的抵制情绪放大后,传播至中国民众,更进一步加剧了两国不友好的关系,影响正常的贸易合作。笔者将这种引导机制概括为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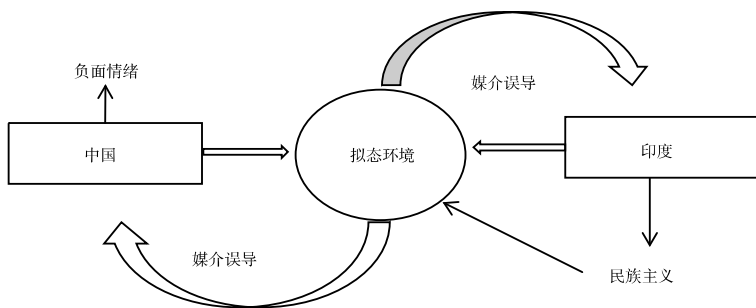


图4 “拟态环境”对中印关系的误导机制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不同国家的拟态环境对于公众舆论的引导存在积极引导和误导的差异性,是一系列内外因素造成的。从内部因素看,交往历史、政治文化、信息来源、战略取向等影响着拟态环境的引导方向。从中巴、中印两国的外交历史和实践经验来看,长时间的交往历史往往深刻影响着本国民众对对象国的印象,如政府不坚持进行引导,很难消除负面印象。政治文化影响着一国政治精英的政治价值观,并作用于决策过程。从对政治领袖研究的结果来看,政治领导人在决策时容易受到本国政治文化的影响,从而决定官方立场。当国家平均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低位时,普通民众的信息来源相对集中于官方媒体或者主流媒体,在信息片面或者非常不完全的状况下,

^① http://www.globescan.com/news_archives/bbc06-3/

其認知也將發生偏差。政府根據國家利益確定的戰略取向直接作用於官方立場，並會通過主流媒體進行廣泛宣傳，以便獲得民眾支持，提高政府的合法性以及政策執行的有效性。

外部因素主要集中於西方國家或者國際主流媒體的影響。因為語言、技術、方式以及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優勢，西方國家及其主導下的國際主流媒體始終掌握著國際話語權。他們出於意識形態和自身利益的需要，在對政治模式異質性國家的報道中明顯存在選擇性、片面性和傾向性，並利用傳播優勢擴散不實信息，從而影響受眾國的公共輿論。

綜合考慮受眾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歷史文化特點和對外交往模式，相較於外部因素，內部因素對於擬態環境的引導機制具有決定性作用。

三、改善中國同南亞地區合作關係的路徑探索

(一) 繼續發揮“擬態環境”對於中巴關係的積極引導作用

在不斷變化的國際格局中，中國必須在不同時期制定不同的戰略重點，“一帶一路”的框架下，中國對於南亞地區的關注重點仍然是巴基斯坦，中國與巴基斯坦多年的合作交好關係使得中國在南亞地區有一個非常強的战略支撐點。除了加強與巴基斯坦的傳統貿易關係，中國還會大量投資巴基斯坦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着力建設中巴經濟走廊，進而促使中東地區的能源不斷進入中國。因此，大眾傳播媒介應該在官方主流媒體的引領下繼續構建利於兩國合作發展的“擬態環境”，向兩國民眾傳播兩國關係友好的訊息，發揮其對中巴關係積極引導的作用，進一步促進兩國友好發展。

另外，以中巴關係為切入點進一步明確“一帶一路”的深刻內涵與豐富外延，在宣傳中要重點突出中巴兩國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等科學理念，以“開放”、“平等”的理念來為“一帶一路”宣傳提供正確思路，強調並突出互惠互惠、協調發展。我國繼續發揮“擬態環境”對於中巴關係的積極引導作用時，要充分利用好多元媒體，以發展“一帶一路”過程中兩國的传统友誼故事為宣傳點來積極、高效地宣傳“一帶一路”，確保這些歷史可為“一帶一路”發展的當下和未來提供助力和信心。同時我們也要有效利用中巴關係大力宣傳中國踐行“一帶一路”的各類事實，將中國高層領導人發展中巴關係、推進“一帶一路”的重要理念、各類規劃舉措以及國內企業的實際行動等進行充分、正面的宣傳，以提升對外闡釋“一帶一路”的真實性與可靠性。

(二) 着力消除“拟态环境”对中印关系的误导作用

尽管中国不会也没有必要惧怕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姿态,但是刻意紧张、恶化与印度的关系也没有必要。就政府层面来讲,中国还是希望通过经济合作的加强,逐步改善与印度的政治、军事关系。况且,中国加强与南亚地区合作的努力中,印度在其中的作用不可小觑,因此改善中印关系非常必要。但是很显然,在同中国的经济贸易合作中,印度仍然存有很多顾虑。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大众传播媒介构建的“拟态环境”非常重要,中国媒体不应再起误导作用,对于印媒或外媒的误导作用,中国也要建立预防及反击机制。虽然中国有能力在印度不愿配合的情况下,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但是在强化与南亚国家经济合作的过程中完全没有必要刻意形成中国与印度关系恶化的图景,当然更没有必要刻意形成其他南亚国家与印度关系恶化的图景。

首先,印度国内部分战略家对于“一带一路”对其国家安全方面形成的担忧仅是一种无事实根据的想象,而“一带一路”带来的经济发展方面的实惠却是实实在在的。我国在对印宣传“一带一路”时要重点强调其所涵盖的无穷的丰厚文化宝藏以及造福沿线各国人民的宏大前景,这是使印度正确认识“一带一路”、提升“一带一路”对印传播感召力的最有效渠道。另外,我国也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与印度的“季节计划”连同其他合作机制进行合作以引导、强化与包括印度在内的南亚诸国的联系。依从地缘政治这一思路,此举不再强调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的主导性转而强调“多边合作”的包容性,有效减缓印度对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可能受牵制所产生的疑虑。

其次,要充分利用好拟态环境,展开针对印度传播“一带一路”倡议含义的精准宣传。结合印度实际情况以及我国利益所指,对印度进行“一带一路”倡议宣传可以中印两国皆为发展中国家、同为新兴经济体和金砖国家、又是邻国这一客观现实为切入点,深入阐明彼此在地区经济合作、互融互通、能源资源消费以及进口等各个领域形成的利益交融点,对印度在南亚地区的特殊地位给予适度尊重,同时就具体合作为其提供实惠。

最后,在进行“一带一路”宣传时要深入掌握印度国家与国民的主要特点,对“一带一路”宣传传播手段展开有效组合,降低或化解印度对我国形成的误解,消除在认识中国与“一带一路”倡议上形成的盲点,软化、舒缓印度对中国的民意对立,借机促成中印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内的合作。

(三) 加强南亚其他国家“拟态环境”的构建

虽然当前中国在南亚地区的合作重心为巴基斯坦,但是不可忽略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就目前情况来看,中国与尼泊尔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将会得到快速发展,此外,中国也开始关注与孟加拉国的经贸关系,逐步构建合作战略。当然,中国不会为了强化在尼泊尔及孟加拉国的商业利益与印度争夺势力范围,恶化中印关系。中国在南亚地区各国的投资战略中充分加入了政治环境这一因素,力保在发展与其他南亚国家经济贸易关系的过程中,尽可能地避免造成新的矛盾或者出现不必要的摩擦。但是,目前国内民众对于尼泊尔以及孟加拉国的了解很少,这就需要大众传播媒体构建“拟态环境”来让受众对上述两个国家及其与中国的合作关系有所认知,保持现实合作关系的开放性和透明度,对合作过程中的事宜及态度进行选择 and 加工,改善民众的认知观念,促进与南亚其他国家的自由贸易合作及共同发展。

(四) 加强对学界、智库和媒体的公共外交,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

要不断增加学术界、智库以及媒体方面的公共外交,不断形成有利的外部氛围。在西方,有些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中呈现的问题大做文章,借助有些国家的非政府组织以及媒体散播中国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大量的收益,不断散播负面能量。当前,南亚各国正处于政治以及经济的转型阶段,其媒体的开放程度比较高,而且新媒体参差不齐,可是兴风作浪的能力不可低估。在实施“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一般需要落实大量的项目,在实施的过程中往往涉及各个方面的利益,这样就会遇到一些突发事件,比如某个国家的反对党或相应的议会议员借助互联网以及各种社交平台大肆宣扬。面对这种情况,相关部门应该和当地的政府进行沟通,开展平等对话,广泛听取反对党的意见,不断使用外交的手段平等解决,实现共赢。

具体来说,可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全力借助包括传统新闻媒体在内的多元媒体宣传的先锋与引导作用,主动引导各主流媒体选取多样化的形式走出国门进行宣传,借助各类新媒体、自媒体以及其他媒介等,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展开有针对性的本土化、差异化传播,巩固并强化与当地媒体的协作、交流。二是有效利用好各类民间团体与机构的宣传作用,这些团体及机构是借助“民心工程”形成良好口碑的重要力量。相关部门可动员部分国内能力与影响力较高的民间机构、团体以及组织,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各同类团体组织展开对话或是交流活动,还应该和当地的居民进行沟通,积极赢得民众的理解,不断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同时,充分借力对外援

助等其他渠道,强化各国的民间了解与交流,为“一带一路”宣传注入更多信心与活力。三是瞄准“一带一路”沿线各个国家的政界领军人物、活动家、智库以及骨干精英等群体,主动与其强化对话交流,借助“请进来”等手段为“一带一路”宣传持续拓展人脉资源,使他们对“一带一路”形成更深刻的理解,并为其在各国宣传提供支持。

(五) 强化“一带一路”政治话语框架的传播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以国际视角来看,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化国家。中国若要提升在国际社会以及处理全球事务时的话语权,在宣传时不能仅关心或探讨与本身相关的话题,同时更要考量可能担负的外部责任,要关心且深入讨论他国的各类议题。具体到“一带一路”倡议来说,则是要强化“一带一路”倡议政治话语框架的传播。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对外宣传与报道要弱化推广“一带一路”的主导地位,不过同时也要把控制好相应的解释权与话语权。中国在这方面不妨进行一些换位思考,即以“一带一路”沿线诸国的视角来度量“一带一路”倡议,使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沿线各国消除对自身国家安全的担忧,增强在经济方面合作共赢的预期,同时,也确认各个国家的文化多样性能够得到切实的保障。

第二,对于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宣传的各类不利或负面报道,相关部门要主动积极展开正面回应,使公众了解事实真相。当国外部分媒体在报道“一带一路”倡议欠缺公平性与客观性时,要在第一时间对其加以反驳及评论;针对部分妖魔化“一带一路”倡议的言论,则要及时揭露,公开驳斥。

第三,了解并消除国际媒体对“一带一路”宣传的敌意,尤其对印度各媒体的误解要做到釜底抽薪。相关部门要及时构建起健全的新闻发布机制,主动为国外各媒体或记者提供有效、客观的信息平台,为其了解中国、了解“一带一路”搭建更有效、更多元的渠道,及时答疑解惑。此举有利于防止国际媒体对相关中国“一带一路”的宣传与事务形成不必要的猜疑,继而为正面宣传“一带一路”提供有效空间。

结 论

从一定意义上说,周边国家特别是南亚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响应程度,是中国对周边国家外交政策起到怎样作用的一面镜子,也是中国对周边

国家软实力影响力度的一种体现。媒体外交作为公共外交的一部分,在塑造相关国家在“一带一路”舆论方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也设置着周边国家有关的政策议程。南亚国家公众中的大多数对“一带一路”的认知来自媒体所塑造的相关“拟态环境”,“拟态环境”塑造的是受众的实际行动,因此“拟态环境”对“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现实图景的构建,将引导周边国家的舆论和政府相关政策走向。多元媒体环境下的“一带一路”的“拟态环境”构建的特点决定了研究“拟态环境”对中国同南亚地区国家合作关系的影响机制更为重要。这种影响无外乎两类:积极引导和误导。由于中国和南亚地区国家关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的地缘政治原因,加之南亚地区国家的媒体政策环境的不同,“拟态环境”在中巴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响应合作上更多地起到了积极引导的作用,而其中印的相关合作响应上则起到了误导的作用。基于对两种导向机制的研究,两种导向机制的形成取决于一些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当然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政治、历史、文化和媒介环境等内部因素。继续发挥“拟态环境”的积极引导作用,一方面要充分反映中国和南亚地区国家合作的成功案例,一方面通过对媒体“拟态环境”构造有重大影响的首脑外交积极推进合作理念的大力传播;针对“拟态环境”的误导作用,就印方一些大众传播媒介而言要通过在合作成效以及合作内容上有所侧重的“拟态环境”的构建,来对冲相关大众传播媒介误导舆论的消极影响,就中方一些大众传播媒介而言,要通过对有关争议和冲突的报道的适当克制,来建设性地避免媒体间互设议程强化“拟态环境”对舆论进而对政府相关政策的误导。当然,南亚地区其他国家对于“一带一路”的“拟态环境”的构建也至关重要,如何提供积极引导作用的“拟态环境”构建的材料与资源,是相关大众传播媒介必须重视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充分发挥起积极引导作用的“拟态环境”构建方面多元主体的作用,扩大相关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效应。值得一提的是,相关“一带一路”倡议的政治话语要以沿线参与国家的成功实践来建构。基于成功实践的话语权,是塑造相关国家有关“一带一路”倡议舆论空间的决定性因素。

(编辑 毛悦)

Pakistan faces with domestic terrorism ,both the project itself and the staff of Chinese companies face serious threats. This article utilizes relevant data from the GTD ,SATP and PIPS databases to conduct a risk assessment of the terrorist threat faced at points along the China – 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This includes an analysis of the sources and forms of terrorist threats at each point along the corridor ,a heat map of key terrorist threats ,a classification of the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and the prominent terrorist methods used in bombings and armed attacks. By strengthening development of counter – terrorism intelligence along the China – 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and establishing a counter – terrorism security mechanism along the corridor which takes into account needs along each point ,China can enhance international counter – terrorism cooperation with its neighbors ,and reduce the impacts of terrorism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rridor.

KEY WORDS: China – 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Terrorist Threats; Counter – Terrorism Intelligence; Project Investment; Overseas Security

The Concept of the “Pseudo Environment” from Cognitive Studies and China – South Asia Regional Cooperation

By Jiang Changjian and Cao Yifan

ABSTRACT: This article conducts an analysis of China’s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South Asia ,with the objective of identifying ways to improve prospects for China – South Asia regional cooperative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Belt and Road by assessing mechanisms whereby it is impacted by the “pseudo – environment”. The “pseudo environment” impacts cooperative relations in two main ways: through positive reinforcement and misleading representations. In understanding “positive reinforcement” ,the author considers the cases of China and Pakistan and China and Bangladesh in detail; in considering “misleading representations” the author looks mainly 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In the end ,it identifies a number of options for consideration: how to continue enhancing the positive reinforcement that pseudo environments provide in the context of China – Pakistan relations; how to eliminate the misleading representations generated by pseudo environments in the case of China – India relations; how to enhance the development of pseudo environments within the context of other South Asian Countries; how to enhance public diplomacy with academics ,think tanks and the media; and work to shape more favorable public opinion.

KEY WORDS: Soft Power; Public Diplomacy; Pseudo Environment; South Asia Regional Cooperation; Belt and Road